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5.023

中国古代辞赋中的农事叙写^①

易永姣^{1,2}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2.湖南师范大学 中国辞赋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中国古代辞赋对农事的叙写,是中国古代务本重技的农本思想、悲叹田园的悯农情怀以及中国文人以隐显志和以园艺表达治业之情的圣道情怀的生动呈现。中国古代的王权制度、农耕传统和崇实务本思想以及文人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观农的立场和心态。

关键词:辞赋;农事叙写;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169-08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在中国古代辞赋中不乏对农事活动的叙写。内容涵盖粮食、果蔬、花木、水产、农业设施等方方面面,既有对农业生产活动的叙写,也有对中国古代农业礼仪的描绘。本文主要从文人视角探究中国古代辞赋中农事叙写的主要类型、文士心态和文化渊源。

一 务本重农的藉田赋

在中国古代辞赋中,对农事叙写最隆重的当为藉田赋。藉,《说文解字》曰:“祭藉也。”其注曰:“祭天以为藉也”;“又为假藉之义”^①。倪岳《藉田赋》云:“臣闻藉者,蹈籍也,人君躬蹈于田也。或曰藉者借也,借人力以终之者也。盖人君事神明,劝农务,礼之不可缺者焉。”可见,藉田是古代的一种吉礼,即天子在孟春正月率领诸侯亲自耕田劝农的典礼。藉礼体现了古代君王对农业的督导。《孟子·滕文公上》记农家代表人物许行之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②认为与民并耕是君王贤德的体现。《论语·宪问》:“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③更是将禹稷躬稼与羿奭不修民事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

后果对举,标举“躬稼”在施政中的重要性。另外,据《礼记·祭义》所载:“天子为藉千亩”,“诸侯为藉百亩”,“祭义耕借所以教诸侯之养也”^④。《礼记·乐记》也云:“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⑤可知,藉田又指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且意义重大,君王、诸侯躬耕稼穡不仅昭示天下食为政先,农为邦本,而且通过躬耕也可让君王诸侯等统治阶层明白农之艰辛,培养敬祀典、重农功的仁风德政。王启《籍弄田赋》写汉昭帝少时即“首率于农务”,“躬耕乎弄田”,“早识邦家之务”。据《汉书·昭帝纪第七》:“己亥,上耕于钩盾弄田。”弄田,即天子示耕之田。颜师古注曰:“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对出生于皇宫,年幼登基的皇帝,弄田实质就是演练扶犁的场地。对此,赋文极力颂美其宏伟意义:“岂无宴乐,不如敬顺天时;亦有游畋,莫若勤劳于农事,是则非同稼穡,粗表亲耕。既留心于东作,宁无望于秋成。环卫近臣,尽起西畴之兴;宫闱侍女,微生南亩之情。于是稼政既修,稻人是率。”上承天

① 收稿日期:2018-02-19

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项目“中国古代边地赋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易永姣(1974-),女,湖南沅江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版2005年版,第23页。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④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4页。

⑤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5页。

意,下为民率,籍田乃敬天和民的德政;天下和乐勤勉,丰衣足食,务本重农的仁风也由是养成。倪岳《藉田赋》云:“考周礼天官之制,而耕藉之礼所由以作也。”认为从西周开始,就有籍田之礼,“粤昉于周,有典有则。然弄于汉昭,废于晋惠,礼其紊矣。开元肆赦,端拱锡爵,礼其渎矣。爰稽旧章夫何足取之肆,惟圣皇以即位之明年,改元成化,采春分之令辰,举耕借之大礼”。虽然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在不同时期天子藉田常有中断。但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帝等几度修复,大加推崇。三国时曹植;南朝宋时徐爱;唐代石启、石贯及无名氏;宋代任豫以及李薦;明代顾鼎臣乃至清朝诸多的藉田赋,彰显出藉田礼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持续性。

籍田不仅倍受推崇,而且礼仪隆重。清王以銜《籍田赋》:“欲顺时而视土,爰布令以催耕。除坛先乎民吏,陈礼诏乎公卿。斋官赫以炤烂,稼台屹以高閼。”农官翻土察看,报告天子,再下诏令修筑祭坛,准备农具,然后百官斋戒、祭祀,这是籍田礼的前期准备。其核心部分天子亲耕的仪式更隆重复杂。石贯《籍田赋》:“入涂场而肆目,抚御耦而举趾,遂乃执红纆,亲黛耜。四顾而沟塍砥平,三推而土膏脉起”,“诸公诸侯而次进,或五或九而皆止”。对此,《礼记·月令》也有记载:“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①选择良辰,天子亲临,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相随,不仅降容强大,而且天子亲载耒耜来到籍田,把耒三推,以示劝农,三公九卿,各级僚属,以此相类,仪式严整。籍礼后还有飨礼,除了颁布了籍田诏,皇帝还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督察,了解和督促农民耕作。而完整的藉田礼,除了开春的耕作,还包含夏季除草、秋季收获等礼仪。这些活动在辞赋都有相应叙写,如晋代束皙《劝农赋》、唐代无名氏的《土牛赋》、清李继圣《农乃登黍赋》《举趾南亩赋》、吴泰《农乃登梦赋》、魏允迪《元日祈谷赋》等。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提出赋的创作原则:“丽辞雅义,符采相胜”,要求文辞华丽和内容雅

正相结合,倘若华而不实,就会“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标举赋体“风轨”“劝戒”的治世功用。而藉田类赋作,或是僚属纪实的献赋,如蔡世远的《耕藉赋》:“臣世远以遭逢之幸,拔自海表,簪笔螭头,侍学鸾署,际兹盛典。”或为命题限韵的考试赋,如清陈希普《拟潘岳藉田赋》为翰林“大考二等第六名”。其创作自然不是纯文学意义的范畴。作者宫廷侍从的身份和他们在君主体制中的政治依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创作必然“润色鸿业”。基于以上两点,颂美君王务本重农与仁风德政自然是藉田类赋作的核心要义。如爱新觉罗弘历《耕藉赋》:“皇上御宇之五年,青帝司方之二月,春风普扇,阳德方亨。天子乃耕于千亩之田,礼也。臣闻圣王务本,耕藉以劝农功。”认为天子顺时而动,躬耕于籍乃循礼之举,不仅体现了唯农是务,而且还是孝的表现。赋云:“明主孝亲,亲推以供祀事。”按《礼记·祭义》:“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紘,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紘,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②天子亲耕籍田所产谷物,专门用作祭祀鬼神的祭品,故亲耕便是对祖先、神明的崇敬。《礼记·祭统》:“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③强调亲身致其诚敬的意义。《孝经·感应章第十六》:“宗庙致敬,鬼神着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④认为君王践行“孝道”,才能通达天地,得到神灵护佑,让天下安定和乐。因此,君王藉田是仁孝厚德的表现,也是天下和乐、万民安享的吉兆。故唐无名氏之《藉田赋》曰:“帝王之德,无以加于孝”,“惟孝之理,惟农是先”。借藉田颂美统治者治国的政治德行和亲民的伦理态度,这是藉田赋之要旨所在。

为“润色鸿业”,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析题守韵,对藉田礼的政治意义、礼仪程式、盛大景观等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是藉田赋的主要艺术特征。蔡世远《耕藉赋》论藉田之礼,

①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540页。

②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页。

③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3页。

④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其义有三:已所自亲,以供粢盛,至孝也;躬习于农,以知稼穡,至恪也;对时育物,为天下率,以劝田功,至勤也。行一事而三善备者,藉田之谓也。”用铺排的笔法从孝、恪、勤三个方面极力宣扬藉田礼的政治意义;每一分句中先以两个四字短句概写其行动,指明其意旨,再以判断句式强调其性质,语句简短有力,感情激越昂扬,颂美之情洋溢其间。西晋潘岳《藉田赋》:“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坻场染屣,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终亩。贵贱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时也,居靡都鄙,民无华裔。长幼杂遝以交集,士女颁赋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总发,蹶踵侧肩,倚裳连襜。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拚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情欣乐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着力描绘藉田礼中不同阶层的劳动场景和精神氛围,以此渲染君臣相随、庶民接续,普天同庆、和乐融融的圣世景象。程廷祚《躬耕藉田赋》:“躬耒耨于万乘,毕振动于群蒸。故九土辟而民罔或懈,千仓盈而岁无不登。此圣王先天下以勤,而固本之至教也。至若礼神祇于郊祀,奉蒸尝于春秋。羞丰洁以笃其庆,献精诚以降其休。旨酒嘉粟而孝假,粢盛苾芬而上浮。此圣王合天下以敬而奉天下以大孝也。藉之时义大矣哉!惟我皇帝,茂育以四海为念,好生以万姓为衷。”从固本至教,以勤劝农;郊祀粢盛,以诚礼神,宣扬君王亲耕,能本而孝,茂育好生的盛德大业。这无疑是国家意识和王权政治的体现。

总之,藉田类赋作多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出行的宏大排场、周严繁琐的祭祀仪式为手段,以颂扬帝王亲躬种德、示勤祈福为旨归,结构宏大,铺陈渲染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展示出“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赋体特征。但这类赋作,情感抒发大多直接显露,程序固定单一,缺少韵致。

二 宏农重艺的农技赋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技能的发展也很重视。中华始祖多以善耕的农神出现,他们通过选种、造器、传播农耕方法,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凭借务本、亲民的德行,赢得民心 and 天下。华夏太古三皇之一的神农氏,是远古传说中

农业的发明者。《周易·系辞下第八》:“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①说其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穡。《淮南子》则曰:“三岁知稼穡之宜,天生菽粟八蜡合万国之享民重农功。以其神于农业,故曰神农。神农之教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蚕以为天下先。”说他天生神农稟赋,受上天眷顾获赐神种,饲养、纺织,教人农耕。后稷也被当作农神。周民族史诗《诗经·大雅·生民》记叙了后稷在农业种植方面的特殊才能:“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②不仅耕田种地,而且辨明土质,严除杂草。天赐良种,说明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种子对于农业丰收的重大作用。《史记·周本纪》也说他喜好栽麻种豆:“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③他能根据土地特性,选择适宜的谷物种植培养,人民也纷纷仿效他。帝尧将其用为农师,使天下受惠。崇奉先祖的优良传统和先祖重农的宏伟业绩,也生动反映到辞赋中。

遵行先祖之制,将勤农务本视为美德和习俗,并滋滋于农事技艺,这是赋作叙写农事的重要主旨之一。清黄爵滋《农桑图赋》:“尔其为农也:……耒耜取诸,仰庖犧而有作;麻麦美矣,奉后稷以为师。马处处以分秧,因时并驾;鸟声声而布谷,得气先知;……况抚兹千耦,当去莠必严;考厥三益,正效功之在即。”写为农应当学庖犧观天象,察地理;学后稷精选良种,具器、各种,顺时应气;去除杂草,讲究功效。清陈希普《农纬厥耒赋》用铺叙的笔法陈说不同农具的特点、功用,应当依据时令、土地、物宜准备相应的农器。清李继圣《农乃登黍赋》:“其长也挺乎高标,其生也播乎大暑”,“形同稷而鞞同梁”,“赤则藁而黑则秬”,“黍熟头低,麦熟头昂”,从其植杆、粒状、颜色及

①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②程俊英,蒋见元:《诗经》,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70页。

③张大可:《史记新注》,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辨认方法写黍之特质。清黄爵滋《春省耕赋》：“草人辨粪种之宜，甸师趣耕耨之器。”写农官各施其职。清盛徵璵《农乃登麦赋》具体描绘了古代农官浸种种稻的方法：“问草人之粪种，爰别夫用麋用鹿而攸宜；稽稻人之作田，分掌夫荡水均水而递改。”草人和稻人都是古代农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官职对劝农、屯田、营田、仓储、田赋、农田、水利等各类事务进行管理。按《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所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驛刚用牛，赤缙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瀉用豕，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用蕢，轻用犬，稻人掌稼下地。以猪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粪种，即将土壤分为九类，选用九种动物骨头煮汁拌谷物种子，种在相应土壤上。草人掌管改良土壤、审视土地，并根据土壤决定浸种方法：润泽疏松的土地用麋骨汁浸种，干涸之地则用鹿骨汁浸种；稻人掌管在泽地种稻，用陂塘蓄水，用堤防阻止水，用沟排放水，用遂均分水，用畦埂留止水，用浍泻水。由此可见，赋中所绘并非文人想像之辞，而是亲临实察后，对农业技能和种植经验的叙写。

对先进农具的赞叹也是赋中农事叙写的重要内容。北宋张舜臣的《水磨赋》云：“奥自大朴既散，机事滋炽，抱甕无讥，牖轮改制。”说明宋代工匠制造业日趋兴盛。“徒观夫老稚咸集，麦禾山积，碓臼相直，齿牙相切，碾磨更易，昼夜不息。”描绘水磨凭借轮轴连接碓臼，昼夜碾磨，作者用老少咸集、围观的盛大场景，呈现水磨强大的功能和时人对其功用的崇拜。“彼华山三峰之飞瀑，吕梁百步之喷沫，独有赏心之玩，曾无利物之实。未若斯磨也，不逾寻丈之间，不匮一夫之力，曾无崇朝之久，而可给千人之食。如是则驴马不用，麦城任坚，农夫力穡，知者图焉。故君子役其智，小人享其利，真为一乡之赖，岂止一家之事！”用徒具赏玩的飞瀑、喷泉对举以水力为动力的石磨，标举其有利于用的实用价值。并从一间水力磨坊，不到一个早晨的工夫就能加工“千人之食”的实例，得出了“君子役其智”，可造福天下的结论，正可谓先进之识。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八云：“既引水注槽，激动水轮，则傍二磨随轮俱转”；“或遇

天旱，旋于大轮一周，列置水筒，昼夜溉田数顷。此一水轮，可供数事，其利甚博。”清晰记载了水车的制造原理和多种功用。说明当时在农具改进上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在文人笔下，水车之用在农业上更是极其奇伟、精巧的景观。宋范仲淹的《水车赋》：“是车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来如。补畎亩之不足，损溪壑之有余。渤潏腾波，忽若刺山之泉涌；潺湲去浪，渐如澄江之练舒。詎见瓶羸，那惭绠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润，苗忻忻兮初如律暖。载脂载韦，几通郑国之渠；弗驰弗驱，自解成汤之旱。动将势旋，发与机会。既引重之象著，亦救焚之功大。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滞不凝；原田每每，用我而无灾无害。”用夸饰的语气、排比的句法描绘水车的运转和水流涌动奔腾的美丽景观；用为人熟知的历史典实、形象的比喻和精巧的对比，大肆宣扬水车的巨大功用。明代何景明《水车赋》也极力肯定这种智举之利：“智则多劳，利则有遗”，“永言临渠，愧彼抱瓮”。清赵九杠、陈其名《水车赋》赞叹水车旱潦、灌退两用之奇伟。清爱新觉罗弘历《水轮赋》云：“因时制宜，奚必资乎匠伯；泽民利物，乃有待于梓人。”认为因时制宜，营造泽民利物的器械，并不只是巧匠的专利，而有赖于所有匠人“相资以济”“因物而施”。作为远离稼穡农耕的统治阶层能注意到先进器械的重要与生成，确实难能可贵。他在政期间，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责令贵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也正是其重技思想的具体表现。清叶兰生《水车赋》写水车之制造似“斗车之运机”“雪车之制样”“纜车之善转”“纺车之扶轮”，其形肖“拟铜龙之善咽”“仿渴兔之旋翻”。在一系列的对比、比喻中道出了水车形制上与其它农具的联系，以及匠者在制作上对自然生物与先人成品的灵活运用与巧妙改进。清赵九杠《秧马赋》描绘秧马不仅写其“背稳”“蹄轻”的特点，而且写其改制精巧灵活之妙：“欲其滑，则腹裁榆枣而工良；欲其轻，则背削楸桐而制密。”说明文人不仅注意到农具运用的奇观，而且还思考其制作成因，这些正是古人崇实务本、宏农重技精神的潜在反映。正如钟志翔在论说中国细节叙事时所说：“理性智慧特别表现为见微知著、察几达变、原始察终的能力。”^①赋文对农技的细

^①钟志翔：《中国细节叙事考原》，《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2期。

致叙写也是中国古人在农业认知上理性智慧的生动体现。

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强调“农为邦本”,中国古代文人或担任农官,或随侍耕籍礼仪,参与巡田、祭祀等,为了实现劝课农桑的政治需求,或是出于“胸怀天下”的使命感而对农耕生产表现出现实思考和热情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甚至参与农业及其相关经验、技术的积累与推进。这些宏农重技的赋文往往来源对现实耕织图景的了解与观察。在实物实景的细致描摹中,大多融入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和真情感叹,因而大多生动可感、富有情致。

三 悲苦悯农的田园赋

藉田赋中所描绘的“千耦其耘”“九夫为井”的壮观场面、“翠羽青旗”“紺轘缥轳”的皇家气势和“东皋如鹭”“南陌争摩”全民兢业,天下康宁的盛世局面,大多是在朝士子对皇权的仰慕或者屈从王权,对君王藉田礼的大肆美化和化育天下的主观臆想。宏农重技、乐耕巧作的美景,也不过是广大田园中极其个别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低劣的生存条件和封建专制的残酷剥削之下,田园的现实景观并非如此美好。

陆龟蒙唐代农学家,出身官僚世家,因屡试不第,回居故乡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东南角直镇),终身以农为业。其《幽居赋》云:“搜束哲之亡缺,补陈农之遗遁。”说明他不仅躬耕农业,并且还致力于农学和技术钻研。其《耒耜经》被元代陆深与《汜胜之书》《牛宫辞》并提,誉为“农家三宝”。据《长洲县志》载,其在甫里吴宫乡,“有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色,无别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鍤,率耕夫以为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①。虽有池塘、田地、牛等,但地势低下,常遭水涝,生活饥苦。为此,他不得不亲自率农夫筑堤防涝。其《田舍赋》:

江上有田,田中有庐。屋以菘蔣,扉以蓬篠。笆篱捷微,方窠稊疏。檐卑欹而立伛偻,户逼侧而行趑趄。蜗旋顶隆,龟折旁涂。夕吹入面,朝阳曝肤。左有

牛楼,右有鸡居。将行瞪遮,未起啼驱。

宜从野逸,反若囚拘。

菰叶覆顶,粗席为门,用细小的竹、苇、树枝等编成简易围墙,随意挖个方洞附上稀疏的窗格,屋檐低劣、门户狭窄,蜗牛壳般笼罩的屋顶,龟裂剥落的墙壁,穿风透阳,左有牛栏,右有鸡舍,行不能畅,睡不得宁。乡野本应纯朴闲适的生活,却似囚徒般的拘束。从田舍的简陋破败、田夫生活的困苦生发,作者探究时势:“盖仕不愧禄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己。使农工之洎民,弃其守而趋仕,农之仕墮于力而希岁,工之仕巧于文而幸贵,商之仕射其肥而啖利,所以国靡凶荒之储,家乏完坚之器,人阙有无之备,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胜剥丧之苦,转从盗聚而充炽。”认为农、工、商、仕本应当各司其职,古人不以利禄舍本逐末跻身仕途,今人却因私利扰乱职守,蝇营狗苟,致使官吏成灾,工、商不作,国贫民困。“呜呼!吾丁此时,何以道之”的感叹表现出对农夫的不尽哀悯和对贪官污吏的无比痛恨。赋文采用散体句式,杂以排比和设问,文气流转、酣畅淋漓。古今对比,针贬时弊,语言犀利直露,在强烈的批判中道出了社会腐朽和农民贫困的原因。

田作之苦忧,也是不少文人亲历后的真切感知。王沂《勤耕堂赋》写室主为保持善心,归居家里后的农耕生活:“夜饭牛以悲歌,晨拥犁而戴星。忘胼胝之作苦,幸褰襦之蔽形。绵绵秧针,衣被清冷。苟令置膝兮,武子过庭。虽娟秀之可爱,卒未知其所成。既幽栗乎旱魃,又明惧乎螽螟。”披星戴月、日晒雨淋,农耕劳作辛苦不堪,从对旱灾、虫害的忧虑,可以想见所谓五谷丰登不过是寄托于自然的美好期盼。明末清初的大儒黄百家的《田草赋》:“羌民生之为业兮,惟农夫为最劳。夏暑雨而流金兮,冬祈寒而折胶。日匍匐于畦町兮,虽勤敏而莫号。”以亲身感受真切地道出了寒冬酷暑农民俯身劳作之辛苦,“奈硗瘠之久荒兮,厥草萋萋。纷总总其状类兮,据我田畴。欲尽殪此柔苗兮,惟尔类之独存。不悉尔之情状兮,何以施我之经纶?”以哀叹、质问的语气真切呈现出莠盛乱苗、草茂难除的苦楚。赋文还用铺排的笔法具体描绘肥田、瘠田、湖田、江田、高田等各类不同田地、不同种类杂草蔓延的情形,作者对杂草种类和

^①(唐)陆龟蒙:《笠泽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生长习性、去除办法娓娓道来,显示出其渊博和务实的农业经验。“盖一长而一消兮,何能听尔之纷繁?独怪天之生物兮,惟尔类之独厚。嗟我苗之日护兮,尚憔悴而难秀,何惟尔之务去兮,乃不植而愈茂。因知天之恶善而好淫兮,自前世而固然。”感叹杂草易生,禾苗难秀,作者通过二者之生存能力的强烈对比,得出“一长而一消”这一原始的自然竞争现象,并进而指控大自然“恶善好淫”,天助尤物、不忧民生的择物法,虽然作者决心不惜劳苦要保护嘉种,但赋之结尾所云“苟天不欲靡望而为茅苇兮,夫岂无年岁之可期”,清晰地表露出岁饶年丰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天意,这一悲悯的感伤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确实是实情实事的呈现。宋王令《南山之田》:“草漫靡兮,不种何自。……雨专水兮日专旱,借不然兮颖以秀。螟悬心兮螭开口,我虽力兮功何有。”虽然此赋意在托物写志,但赋中所叙荒草弥漫,水害成灾,辛劳无果的悲惨图景无疑是来自于农村现实。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和以农为本的传统经营理念下,“耕”是生存之本,对于中国古代文士而言,或因家贫,或因“身退”,务田耕种也常是他们不得不为的一种生存方式。辞赋中的田园悲苦之叹,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农事的真切感知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农村悲苦生活的描绘,往往是当时人们生存境遇的艺术呈现,虽然质朴无华,但最为真切感人。

四 德化乡野的耕读赋

在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传统经营理念下,“耕”是生存之本,“读”是迁升之路,对于广大中下层民众而言,耕读既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思想有效整合后,在不堪浊世的情态下常常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辞赋中不乏表现耕读之美的作品。如唐桂芳《耕读堂辞》认为:“古者士出于农,而耕读未尝分也”,赞扬鲍深能边耕边读,两者兼顾,有古士者之风。写其耕读生活:“跋历山以叫虞舜兮,吊伊尹于莘野。苟舍己以芸人兮,宁长歌于牛下。朝驰骛于艺圃兮,夕翱翔于书林。羌岁月其川逝兮,孰有察予之初心。

嗟鲁圣与邹贤兮,尚遑遑其求索。矧吾侪之玩愒兮,宜分阴而爱惜。谓世代之既远兮,亦有见其庶几。纷美人之肥遯兮,表耕读以自怡。”居于田园之中,虽也有如农者之劳于力,但心境高远,追慕儒家圣贤,读书好古,淳朴自持,“指古人以为则兮,视今之人何其”,在崇古愤世中体现出陶情冶性,自善其身的精神寄托。谢应芳《闲居赋》开篇即云“夫何予性之耿介兮,与时俗之寡谐。筑屋室于幽僻兮,离喧嚣与氛埃。繁前修之可慕兮,矧古道之可追。”表明自己生性耿介,时与我违,厌恶流俗,希望隐居以求独美;“朝吾游于道圃兮,夕吾憩于艺圃。……列左图而右史兮,置前琴而后棋。春吾蚕以为衣兮,秋吾获以忘饥。”远离了俗世的喧嚣,这里的生活不仅充满了高雅的情趣,而且作者亲身参加劳动,琴棋书画,逍遥自乐,故此,作者直抒肺腑:“宁抱余之真独”“欲索居而离群”,强调自己离群索居,抱守独真,超然隐逸的人生追求。北宋郑刚中《山斋赋》写自己躬耕山野,与鸟兽同居,俨然“山中之物”,但“草茅之性终在,烟霞之痼不痊”,表明自己心在山中,本性难改。这一类型的赋作往往注重于感情倾注,重在展示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情趣,努力营造一种“清静无为”“息心去欲”的境界。在精神境界上,表现出以圣人之道自砺,不从权势,坚持道义自守的强烈的主体意识。

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维护“礼治”,倡导“德治”,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年青时以孝行闻名,故“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①。凡他劳作的地方,都兴起礼让的风尚;凡他所在之地,人们都愿意追随。《史记·周本纪》记载了西伯“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②,以其仁德,不仅赢得贤士归顺,而且还以德行化解了诸侯争端。中国古代儒士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推崇、膜拜圣王德化天下的传统,因此,颂美贤人德化乡

①张大可:《史记新注》,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

②张大可:《史记新注》,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野成为农事叙写的重要主题。其一是古之先贤。清赵九杠《莘野躬耕赋》写商之元圣伊尹,潜踪栖迟之时,托业耘耔,“贞农夫为伍”“高野处之风”“尧舜之道示泯,畎亩之乐有余。”“熙熙乎自食其力,噤噤然不改其初。”认为野处高风,示泯尧舜,正是贤者高于常人之处。清曾绶《耕者让畔赋》颂美周文王讲让型仁:“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教兴钟鼓,泽被邻雠。”讴歌人们和乐礼让之风:“雍雍蔼蔼,攘攘熙熙。出入守望之间,相友相助;耕凿食饮而外,不识不志。”其二是追慕、仿效古贤德化乡野的雅士。戴表元《耕宽堂赋》写孙常州辞官归隐,自放于耕,取堂名“耕宽”。赋文论退隐之士以“耕”求宽的办法:

今先生封疆道德,哇吟礼义,播治群籍,壅崇列艺。岂弟闻望以为嘉谷,优游笃老以为乐岁。方欲发廩廩,洽春秋。途无邻之不恤,远无乏之不周。耆年胜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风》,乃歌《白驹》。文孙愿息,前挨后扶。严良日进,迎猫虎也;雅素时飧,尊田祖也。清伤和水旱,远败类之雀鼠。若然者,菜盛焉而神莫予吐,盖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竞不窳,不莠厥土,亦不秽予宇。藩墉牖户,以保百世之风雨。

认为孙常州研习经典,礼乐修身,道德深厚,决不同于声望利禄之徒和山林独善之士。《南风》,古代乐曲名,相传为舜所作。《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①《孔子家语·辨乐解》则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认为琴音具有正人心的功用,舜奏五弦琴,歌《南风》用琴音感化人民,故其国生机蓬勃,美德如泉流不绝。此赋解说先圣前贤以德化民,以礼育民之举,提出儒士退隐之“宽”:

故自古仁贤之居位,其为政也,往往可以驯盗贼,驱螟蝗。必不得已,穷居而野处,犹能使贪夫吝吝,愧耻于其乡。嘻乎先生,逍遥兹堂,想见邻曲闻风而逊畔,交游熏德而称良。人怀《阙里》之训,家哦《召南》之章。然后道路歌惠,

穹只降康……。

认为孙常州应当承先王之道,教化民众,造福乡邻。这正是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有志于道,隐其身而不移其志的体现。戴表元《喜友堂赋》论说兄弟同处同耕之喜:“且先生自以无愿于人,而道伸于闺门;自以无用于世,而政行于邱园。三亩之宅,十亩之原;弟耨于后,兄耕于前。既孝既友,从容笑言。酝比醇醴,盎如春温。凡登斯堂,与饮斯醴。归视其家,谁无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诸己,将令吾徒闻风而起,将令吾居胥为孝友之里也。”展现兄弟同耕、和睦共处的欢乐祥和景象,并将孝上升到道义和教化推行的高度。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谓“悌”,是指处理兄弟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孝道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孝治天下”是最核心的统治思想。赋文颂扬室主孝举的深远影响,表现出作者儒者德化天下的淑世情怀。

在中国古代,入仕是士人的理想正途,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实现,而且即便是文人士子能够济身仕途,甚至飞黄腾达,但是因为世道纷乱,政局变化无常,或者因为文人本身耿直高傲、浪漫不羁的性格,所以大多命运坎坷,迍迍波折。历经仕途的艰难后,直面现实,改途返归是许多文人的必然之选。于是隐逸乡野,耕读田园,因为内心饱含着对现实政治的失意和无奈,所以刻意美化田园的宁静、和谐和居者之淡泊、高雅,不仅能抚慰心灵,而且还吻合着古代“德治”观,彰显出儒者隐居求志的高雅情怀。赋中对农耕的描绘多是抽象的,充满闲雅和自由的意趣,对居者淡泊心境和高雅德行的评析、颂美则充溢着理性和思辨的色彩。

五 理花布政的园艺赋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园林逐渐成为文人雅士安居乐处之所,表现在辞赋中,作者园林审美情趣不仅有极大的提高,而且将园林技艺与儒者的治世情怀有机的结合起来。这在耶律铸的赋作中尤为明显。

耶律铸(1221-1285年)是元初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人物。其父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大臣,推崇中原文化,并有深厚的汉学功底。任中书令(宰相)后,积极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在政治、

^①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页。

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卒后,其子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随宪宗征蜀,屡出奇计。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为朝廷制礼乐、修国史,崇尚儒学,主张德政。从他的赋作中可以看出其文化素养、生活态度、从政思想以及心情的起落。其《方湖别业赋》云:“有田一廛,有宅一区。我引我泉,我疏我渠。我灌我园,我溉我蔬。蔬食为肉,安步为舆。行吟坐啸,足以自娱。”有田、有宅,还有园林、亭阁,并且作者还在园中从事灌溉种植。不仅为生存之需,也为享园艺之趣。其《天香台赋》《天香亭赋》《独醉园三台赋》《独醉园赋》《独醉亭赋》等赋都表现出他对园艺的无比热爱,“一花一草,亲移自植,计日成趣”(《天香台赋》),他亲身参加园艺种植,并且乐此不疲。耶律铸性喜园艺,特别是对牡丹花尤为钟爱,并对之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亲自从事种植实践。他说,创作这些赋文“会侄子辈遍传诵咏,往往质其所疑。……因命书史为音注,应其所请以示之”。因此,他在赋中作有许多夹注,措词简练清晰,材料精当,而且大多还注明了出处,为后世提供了丰富、实用的园艺信息。不仅如此,他在园艺种植上还倾注着治国的热情。如《天香台赋》虽然以台为题,但只写台中牡丹花,以花彰显室主人品,进而论治国、处事之道。赋文写园中以前的荒芜景象,论说自己的治理之功:“余承其弊,将任其责,推心于物,旁搜远索。索彼得失,洞研究核,从其可从,革其可革。细诸荒惑,探诸幽

赜。举诸明算,运诸成策。辨乎根发,定乎名色,甄其瑰奇,廉其瑕谪,移以殿最,品以资格。”总结花圃整治的措施与方略,强调自己认真负责,研究利弊,多方考索,辨别良莠,去革严明得当,因而终于达到“粗有是治”的效果。耶律铸继承了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富有谋略,且政绩显著。但作为先朝旧臣,在当时政局多变的情况下,耶律铸却屡罢屡起。最后因罪被罢官,家产籍没一半,隐居山后双溪别墅。从赋文前面部分对牡丹花秩序等级展开叙写以及结尾所云:“然天下之事,曷尝有异于是邪?九土一台也,六合一园也。百花一王,万国一君。为国之道,在布此花之政也。经国之要,实理此花之任也。”我们不难领会其借园艺以表述从政思想、治国策略的用意,以及对开明政治的渴望和对当时混乱朝政的不满。其《天香亭赋》铺写天香亭众多牡丹名品的盛丽姿容,进而由植花之艺评析万物之理:“名其末也,去末犹荣。实其本也,舍本不生。苟宾其实,庸主其名。宾主易位,乱是用兴。是谓开塞之门,荣悴之所由也。”认为凡事皆有本末之分,强调固本强元,根深强基的重要。但从“宾主易位,乱是用兴”,可见他对“本末”的探讨已深入到社会治乱的高度,在恬静淡泊的外表下,显露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内心的愤懑和落寞。其对园林技艺的叙写既是对实景、实况的真实描绘,也是作者治业之情借助象征手法的生动呈现。

Narration of Farming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s *Fu*

YI Yong-jiao^{1,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China Research Center of *Fu*,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a's *Fu* narrated the farming activities, which vividly presented the ancient China's agriculture-oriented thought of emphasizing on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e sentiments of Chinese literati who pitied the farmer by lamenting the pastoral, and the sacred feelings through the literati's seclusion and gardening. The imperi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the thought of holding agriculture in esteem, as well a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literati, all determined the standpoints and mentalit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s views on agriculture.

Key words: *Fu*; narration of farming activities; the mentality of literati

(责任校对 刘兰霞)